

社火·社戏

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

系列主编◎郝苏民
系列副主编◎马忠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丛书总主编◎祁庆富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第五集）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第五集)

丛书总主编/祁庆富

系列主编/郝苏民

系列副主编/马忠才

社火·社戏: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

蔡秀清 钱永平等/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火·社戏: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蔡秀清,钱永平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8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田野报告系列丛书)

ISBN 978-7-81108-583-9

I. 社… II. ①蔡…②钱… III. 民间文化—风俗习惯—研究报告—中国 IV. K89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757 号

社火·社戏: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

作 者 蔡秀清 钱永平

责任编辑 覃录辉

策划编辑 沙 平

装帧设计 张日河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583-9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类学·民俗学及其田野

——我们从这条路上这样走来*

郝苏民

1984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终于创办了自诞生30多年以来首个院级研究所，即西北民族研究所（此前在“十年动乱”后，方有一个民族教育研究所[筹]）。曾是参与当事人的我们，其动机原本出自对“十年动乱”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研究所名还是当时国家民委领导人拟定的。这个反思的根据就我们那时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建立肇端，代表中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权，一反千年封建王朝和1949年已全线崩溃的国民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要在全中国范围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工作，少数民族干部和懂民族语言与能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干部的迫切急需，成为一切工作的首要。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共和国第一所民族高校，便是西北民族学院。应该说，民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光辉的一页。然而令人难解的是，从成立伊始的1950年，直至1984年前，本身就体现着新中国全新民族观与政策的第一民族性高等学府——西北民族学院，虽也有过一个运行时间很短的“研究室”，却未曾有过科学意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专业建制与教学队伍的组建！新中国初期，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相关专业经过“院系调整”后迁到西北民院的蒙古、藏、维吾尔语文教学，整合为“语文系”，完全成为解决民族语文翻译急需的性质，而非民族学专业。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畸形”，责任与损失并不都来自学

· 2 · 社火·社戏：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

院本身与办学者个人，它与当时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之类学科在中国的遭遇完全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十年动乱”、“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的确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人和教育者们既是一个极大鼓舞，也确实促使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一个认真反思：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所谓“红色政权”及其造反派们一举“砸碎”、撤销这所新中国首所少数民族高等学府时，其一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肆意妄为，竟是那样地顺利得逞！曾参与创办这所学校的师生们为什么竟是毫无理性抗争，亦无正义反对？……所以说，1984年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创办，应该视为当时本院民族学人、教育工作者与当时国家民委领导人痛定思痛的一个学术心愿和忠诚民族教育的初步圆梦！

然而，发展的道路又总是曲折的。意外的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却能带来所谓“全民下海”（单位创收）的冲击，一时大学捷足先登者从办班中捞上第一桶金后，便产生了连锁效应，吸引不少当时本在坚守岗位的教师们为之心动。希冀重建人类学的敢想者中也出现了教学与科研比重的意见分歧，科研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经费短缺问题无从提上日程的迷茫，而此直接涉及到教师们工作量、课时、职称等切身利益的不平与困惑。自然，复杂的表层不能掩盖其简单的内因：历史关头老校如何“新生”，学校未来整体发展如何构架？民族性老校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时代使命的角色该怎样定位，哪些是理性实证了的真正“拳头”专业？一应恢复、重建哪些机构？又该急速补缺扩建哪些必有的学科？……实话实说，这些本为教育、办学内行领导的例事，那时我们却还在该不该调进某人、该谁来办某事等人事关系上纠缠不前。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念，在那时还无法“理直气壮”地进入所有负责人的指挥头脑。自然这里的专业人员一时被这些“不大不小的问题”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十年动乱”已耗费多少年华，而之后，难道还要空待大好时机这般

流失？事到此时，方知为这等“文化大革命”须付历史代价之了得；方知真正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知识的缺失于民族高校的创办、经营关系的重要性何等至关！然而，必须有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之患今后仍须渐次从各方——在高校显出……

事情原本还有另一面，其时，一是全国先行者高校教学改革如火如荼；二是部分研究者受全国学界大好形势感染不甘心无所作为去坐地搞“创收”。经过彷徨、内外沟通、酝酿，再经过“年年五月换领导”的“阵痛”，终于在1998年10月，借教育连续改革热潮启动和校方一些领导认同，以放弃原基础资料设备和经过几次整合的队伍、研究所名称、建制和大部分成员为代价，仅从其中三五青年学术同道加个别老先生，走出了原本满怀希望的西北民研所的大门，重新组合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系）合一的机构。这个人类学、民俗学名称的出现，为这个“共和国首座民族高校”办学近半个世纪后首次整合、填补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空白；也在民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的学科建制。2001年7月26—8月4日，在费孝通教授力荐下，借教育部为北大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在西北重镇兰州与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及西北民大合作举办了全国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研班。

费孝通先生煞费苦心，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大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二为开发西北培养西北各民族此类专业的研究人才。费老亲临民大为我系揭牌，并在开幕式和研讨会作《民族生存与发展》、《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的主题讲演和讨论中的“插话”；还召开来自大西北各地青年的专题座谈会，谈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专业人才的重要和迫切意义。他语重心长、深入浅出，这给有志学科建设者们以极大精神支持和学术“扶贫”。

1990年我们曾首获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钟敬文、马学良、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惟图学术的胸怀和勇气，成了真正“助人成功”的关键），1991年即开始招收民俗学研究生的教学。鉴于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化（含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社会学教学的开办，我们打通了三门学科的交叉，为以往全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传统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选修课的惯例，以每位研究生的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为本，定其专业研究的具体方向。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至2007年，这个教学点共招生了13个民族的134名学生，已毕业生近三分之二以上成为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考博生源，他们分散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山、复旦、南开、中央民大、华东师大、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博、“进站”。这一集中现象是西北民大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人、训练队伍的同时，积累了不少以专业要求采集到的比较有质量的田野民俗志的新资料。尤其近年来，费孝通教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问题后，我们参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了文化部、科技部“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民俗部分的任务中，更坚持了研究生们在导师指导下发挥地方性知识和少数民族语言无障碍的优长，深入生活第一线，零距离现场考察的专业训练的学风。民俗学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历练了教学骨干的同时，区域民俗志资料的成果，累累结枝。我们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民俗志数据库资料。

我们这个系（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借助全国形势好转带来的时运，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人类学·

民俗学学院”。我们把民俗学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路子，摆脱开往昔传统上仅从“文学”上先入为主，唯以“民间文学”带动民俗学的旧教学轨道，借鉴相近学科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优势，既互相交叉渗透、互促发展，又各自保持相对学科独立地发展轨迹。我们用超强的劳作先后开办出游牧、农耕、人口较少民族等民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类型；民族、宗教、文化、家庭、妇女、影视、民间艺术（美术、工艺、歌谣、戏曲、舞蹈）等专业方向，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学生学养的丰厚、“一国多民族”的整体性大视野提供空间，以适应转型期人才市场的多样需求。目前，我们除已有的民俗学研究生点外，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等的硕、博生的教学都在有序地进行和不断改进完善之中。

这五年来，我们有北大、北师大、中央民大等高校相关先进专业和其中名师们的协助和具体帮助（如北大的马戎、王铭铭、邱泽奇，中央民大的杨圣敏、祁庆富，香港中大的陈志明，人大的郑杭生，辽大的乌丙安，南大的刘迎胜，北师大的刘铁梁、董晓萍、万建中……），在大开局面中曲折前进。我们的民俗田野，涉及到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到除大西北外的内蒙古、四川、湖北、福建、安徽、山西、山东，甚至东北、西南各地。

同时，在物质条件极其不足的状态下，我们坚持依靠业内同行经办好我们的专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获得学界广泛认同，成为CSSCI刊物，也成为这三个学科硕博生和专业教师们喜爱的“敬重名流爱新秀”，“学术面前皆平等”的一块公正平台。我刊帮助各高校不少素不相识的本专业硕、博士生成全他们学位论文的问世；我们也帮助不少高校本专业多无个人关系的教师为晋职而难以发表的论文及时刊出，为专业队伍的形成，尽了我们一份责任。

又一个十年教学实践使我们感悟到：虽无理由更改已显成果

的途径，但此路子离幸得历届某些领导认同的事实，会常有不断的苦恼和艰辛！好在各高校圈内同行认可的这个探索，仍可视为一种有益的中国地方性学术经验。事实上，在我们之后，也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界大师级老一辈代表人物费孝通、钟敬文等谢世之后，我们看到：从一度誉为中国民俗学人才摇篮的北京师范大学到边陲内蒙古师范大学，也都先后改制或创办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模式的教学建构……事实使我们欣然！

不久前，高校在一阵扩招、扩办、并校、升级之后，据说出于“冷思考”地调整把高校分类为“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几种发展类型，又似乎学校一旦被划进某种类型后，即将在某类型框子内以行政“规范”去“游戏”管理。历来各校内各学科、专业之间大约已有的发展水平不尽均衡、相同，是将随所属学校类型“一刀切”而对学科去、存、“凝练”？还是以所属行业学科实际水平去“强强联合”（如同当年之“院系调整”）去整合？还是随其各校自主“挖墙”、“流动”、“自生自灭”，以示“市场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抑或已有资源自主存留等市场经济范式？……在如今高校领导皆为专业内行，大都系博士、教授，然而并非全是教育内行的现状下，自主趋势如何发展大学，大约仅为普通身份的专业教授在学科建设、发展中发挥不了多大决定性的作用？故，大抓学科建设、学科凝练之云的真正落实，看来确实在于是否哪级所属，在不在某种“工程”之内大有关系；各高校的个性、特性或优势发展，合力如何形成？是高校的主人们来认同、推动，抑或是高校领导集团或一把手来运动高校群众？一时还看不清楚。至于教授今后走向，也和本人现属哪块“风水宝地”关联在一起！虽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对象全关乎到群体、社会、人类、文化的大范围，但此类学术属性，往往不像办体育、办艺术那样红火而幸运；确实是一种不大显露政绩的“孤独性”学问！有可能抓学科建设的专

业内行领导人，对它了解或是否感兴趣会成为它发展顺利与否的关键吧……

当然，杞人忧天也大可不必。“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真理名言，还是无可置疑的。

好在，我们曾经的努力基于事实亦曾经地被其时本界所认同过；“有无必要”之说，本为各自所指各有个人的理解、界定和认可。无论如何师生风餐露宿的“田野”是为学执著的“书呆子们”汗水的播种。于是，仅仅出于其时一个教师的我们，本着曾经为师之心、师生同窗切磋、或曰“教学相长”之情，将把部分学子为攻读学位而参与的调查报告，做初步学术规范和可读性的整理后，以一种资源回报给社会群体；也为这世变万机的新世纪之际，师生们从前沿生活大潮中舀出的这一瓢瓢底层的生活浪花，存留给来者而感到努力过的欣慰！我们自认为这一行动对学术浮躁尚不能一个早晨就烟消云散的今天，于师、于生、于己、于众、更于学校之心，当年大师之良苦用心，皆心同此理吧！

若幸甚而存继续从业之机，我们随时准备用被边缘化了的文化行为寻求可认同的学术合作伙伴。

我们的“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的编辑，虽也曾得到本学界不少贤达鼓励、促成，但终因未能直接挤入“本土”的“工程”类和“扶持”类，不足的经费导致了无法“满书尽披黄金甲”的华贵包装及名人作序牵衔、领导们的结合而春风满面，只能是“素面朝天”，以真人真事的朴实面孔迎接她的识者——社会广大民众和莘莘学子了。

本系列之一，曾为配合中国艺术研究院“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重大项目中民俗部分的采集，归入另一丛书出版；本系列之二、之三、之四共三集经本学院文化（苏依拉）博士努力得到本校资助在兰州大学出版社统一出版，由青年教师马忠才、满珂等博士热情协助，出版社责编先生们的慧眼、支持、

辛苦都是感动于心的。

现在为系列之五、之六、之七、之八共四集由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教授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出版。到此，这一系列八本书，是分别由三处支持才问世的。但是从西北民族大学初创社会人类学·民俗学专业到培养出自己的硕、博生和他们的成果，我们实在是得到了不少贤达和学界君子们在关键时刻的真诚爱护、支持和帮助才有些许做为的。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又逢“国学”重新被大大提倡，教育新时代青年一代也要知恩图报，不可满城尽当“白眼狼”之际，我作为这个系列各集成果出版的操办和见证人，深深体味了出版学术书籍的不易，不能不郑重提出下列先生和同学，因他们的理解、呵护、支持、辛劳，作为其时导师今同主编的我，以及各集的撰稿人在此一一向他们致以中华民族传统式的抱拳和鞠躬：真诚地谢谢你们诸位了！

除已经鸣谢者之外，他们还应是：费孝通、马学良、宋蜀华、毛公宁、马麒麟、谢玉杰、金雅声、杨圣敏、马戎、王铭铭、祁庆富、覃录辉、沙平、马国柱、僧格、文化等诸位先生；此外，满珂、马忠才、王淑婕、那贞婷、曹玉杰、刘秋芝、王淑英、佟格勒格等硕、博士同学们。

于金城沙痕书屋 寓所 2005 年 12 月岁末
2007 年元月修订

* 注：此篇是作者为《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丛书所写的序言

目 录

系列总序	郝苏民(1)
民间舞龙习俗中的民俗主体与乡土文化	
——对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龙灯艺术的考察	
.....	马志华(1)
民间小戏与乡土社会民众的互动状况研究	
——以祁太秧歌为个案	钱永平(57)
青海土族节庆习俗中的生存理念研究	蔡秀清(135)
民和土族“纳顿”节庆习俗的现状调查与研究	
——以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鄂家村为例	贺喜焱(185)
茶园“花儿”歌手研究	
——以西宁市茶园为例	戚小萍(221)

民间舞龙习俗中的民俗主体与乡土文化

——对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土城子 镇龙灯艺术的考察

马志华

导 言

一、研究缘起

中国特有的龙文化派生出了许多与龙相关的民俗文化内容，舞龙就是其中之一。一般认为，龙舞是汉族的传统民间舞蹈，它与汉民族的重要节日——元宵节密切相关。我国南方的一些民族如布依、侗等民族也有特定节日下的、拥有自身特色的舞龙表演。舞龙习俗也因地方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多彩的特点。又因其伴随着中国传统的年节文化，更渲染了许多喜庆祥和的色彩，是节日中不可或缺的文体活动。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土城子镇，因其独具地方特色的舞龙表演于2002年12月被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评为“民间社火艺术之乡”。土城子镇的龙舞百余年前由河北、山东一带传入，历经百年传承不衰，是当地民众情之所系的民间艺术形式，在生产生活上对当地民众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的舞龙表演，其道具的制作者和耍龙的把式是以回族人为主的。文化的流动，给这座塞外小镇打上了更深的民间文化的烙印。同时，也让古已有之的司水之神——龙，在这一方水土上扎下根来。回汉两族在这座小镇上共同生活，传承百年的龙舞艺术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特定环境之下的乡土文化氛围，而

舞龙则成为两个民族在文化认同上的纽带。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多种因素的介入，土城子的舞龙习俗面临着停滞的危机。本文以民俗主体为切入点，考察和研究该地舞龙这一动态民俗事象中的俗民及其在特定乡土文化背景中的角色，透视俗民由地理因子和生存环境引起的群体意识和共同社会心理，并对乡土文化与主体意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乡土文化的存在状态作一探讨。

二、研究意义

只有保持活态的民俗事象，才可能在脆弱的民俗生态中得以延续生命。民俗是动态的，因为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研究民俗文化的着眼点不仅要放在事象本身上，更应放在执行了这一活动的人，即俗民身上。对于舞龙习俗而言，诸多的论述大都将目光放在了龙舞这一事象上面，从各种角度描写不同地方特色的龙舞，从制作到舞耍，而对龙舞习俗的民俗主体的关注则略显不足。通常意义上来讲，舞龙舞动的是人的精神，无论哪个地方文化背景下的舞龙表演，都不应回避此种因素的存在，因此，将民俗主体在舞龙习俗中的角色以及角色规范下的行为和心理作为研究探讨的重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单把舞龙习俗作为一种游艺民俗进行考察，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在民间，关于舞龙动因的神话如若天上的繁星，从中可见人们最初进行此活动是出于一种对于水神——龙的原始崇拜。这样一种信仰，是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背景下农耕文化的产物，这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像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这样的个别地域，活跃着以回族为主体的舞龙队伍。民间舞龙习俗的民俗主体因此而变得新鲜。土城子镇龙舞习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一习俗是百年前迁徙而来的回族从山东、河北一带带到这一地区来的。舞龙文化的传递经历了汉→回→汉的过

程。通过回族人的承载,舞龙习俗再次在一个汉族为主聚居的区域稳定下来,并在回汉两族之间形成一种默契,这是移民入迁后重组的乡土文化。在这样的乡土文化氛围中,回、汉两族共同生活在这方水土之上,镇北山坡上的清真寺,默默地遥望着苇塘河岸树阴掩映中的九神庙,平和的气息已延续了百余年。将回族人介入的舞龙习俗放在民俗学事象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视角之中,不论对舞龙习俗本身还是对民族文化的整合来讲,都有突出的代表性。而且,以土城子舞龙习俗为个案,可以以点带面地窥见乡土文化的盛衰轨迹。

三、文献来源与文献综述

文献来源。搜集到的关于舞龙习俗的论文,主要源自《中国民俗学论文索引 1974—2000》一书及中国期刊网和人大复印资料等学术性网站,1974 年至今与龙舞有关的论文共有 30 篇。与舞龙习俗相关的专著和书籍,主要是在超星电子书库和国家图书馆网站上获得书目,以借阅和购买的方式完成对书籍内容的把握。以上是书面文献的来源。本文依靠的主要资料源于田野调查,这些资料来自地区文化部门和调查对象的口述。

文献综述。关于龙舞,论者不乏其人,涉及的种类几乎囊括了中国大江南北的所有龙舞,从龙舞之乡重庆铜梁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偏远村落,都有所论述。论述的角度也各有侧重:1.《中国龙舞》,梁力生主编,重庆出版社,2002 年版。该书综合了龙舞习俗各个方面,从总体上概括介绍了龙舞的种类、历史渊源、民间习俗、民族和地域分野,深刻地分析了龙舞的文化内涵、艺术风格以及龙舞表现出的民族精神。重点介绍了舞龙的程式、不同种类龙灯的舞动技巧及舞龙的道具和舞龙的队形。宏观上讲,它涵盖了中国龙舞的各种风貌,但书中并没有涉及回族人舞龙的洞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内蒙古卷》一书中,涉及到了内

蒙古赤峰地区的回族民间舞，即龙舞，其中就有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的龙舞，概述性地介绍了它的仪式、表演风格和表演队伍，记录了舞龙的伴奏音乐和舞动技巧，也描述了龙舞的造型、服饰和道具。这里只有客观性的描写，并没有更深层次的剖析。2. 关于龙舞的论文可见到的有 30 篇。这些论文大致可分为三类：①事象介绍性的资料。这些资料涉及到了各地不同特色的龙灯制作和表演风貌，从深描理论的要求来说，其准确性和细微的程度还是不足。②探索性的论述。论者们从理论的角度切入到舞龙的文化底蕴，解读其艺术性或分析这一运动的生理特征，也有的文章涉及到了舞龙习俗的社会功能。总体上讲，这样的理论分析就舞龙习俗这一民俗事象而言，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然而对于民俗主体的关注仍没有充分体现在论述的主体之中。③漫话性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传说或神话角度介绍中国舞龙的由来，或者涉及到龙灯会、女子舞龙队等。这样的文章是从客观上陈述舞龙习俗和地域风情的，不属于理论探讨性的文章，但的确展现了中国龙舞多姿多彩的民俗魅力。3. 田野资料。调查地基本情况的介绍，来自方志和地区文献，包括自然地理、人文风情、经济、交通、生产、生态及人口等各方面。关于舞龙习俗、神话传说、龙灯的制作、舞动技巧的记录等都源自艺人口述，因为出自实地调查和专业的访谈而更为翔实可信。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有二：基于所获田野资料，进行实证性研究；以舞龙习俗中的民俗主体作为切入点，对特定乡土文化背景下的民俗事象与民俗主体进行整体研究。

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运用多种理论加以诠释：民俗学中的民俗主体论、民俗传承论，借鉴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和高丙中关于民俗文化 with 民俗生活的洞论对舞龙

习俗中的诸民俗因子和主体对乡土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与实证性研究。

五、基本概念界说

1. 龙舞

根据梁力生在《中国龙舞》一书中的界定：龙舞，也称“舞龙”，民间又叫“耍龙”、“耍龙灯”或“舞龙灯”。一般来说，在各节龙栋内燃烛或点灯的称为“耍龙灯”或“舞龙灯”，不燃烛或不点灯的称为“舞龙”。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的龙舞因白天不点灯，晚上点灯，因此本文称其为舞龙、龙舞或耍龙灯。

2. 舞龙习俗

本文所指的舞龙习俗，将龙舞中的各民俗模式全部涵盖在内，既包括龙形道具的制作和舞龙的技巧，也包括龙舞中的各类仪式，以及当地与龙舞有联系的其他各类习俗。

3. 民俗主体

民俗主体，即俗民，也就是指负载民俗文化的人。不论他们是以个体还是群体的形式参与民俗事象，都在民俗活动中承担一定的民俗角色，是民俗活动产生的动因，是活动的支配者。

4. 乡土文化认同

文中所指的乡土文化，即由广大民众所创造、负载的民俗文化。乡土文化认同，除了指不同族域的民众因特定民俗文化而产生的心理上的认同外，还包括民众对乡土文化的存在和延续所持的态度。

六、研究假设

通过对于研究对象的探查和分析，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1. 特定的生存环境和地理因子造就了当地的舞龙习俗和独特的以回族人为主体的民间舞龙队伍，也使民俗主体共同的群体